

辽宁党史人物传

宋任穷题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
辽宁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编

宁党史人物传

宋任穷题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
辽宁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辽宁人民出版社 编

目 录

郭隆真	罗占元	许庆昌 (1)
黄火青	李秉刚	王恩宝 (28)
邱先通	喻席安	董发根 舒泽金 (75)
黄显声		周平生 (95)
包 乾	卢卫权	康爱琴 (128)
左子元	尚振生	卫庆堂 赵金付 (139)
张海川	尚振生	卫庆堂 (147)
李向山		侯玉琴 (155)
牛荫冠		王泮久 (169)
薛 明		孟祥卫 (210)
张克威		刘 斌 (225)
赵龙韬		赵东阜 (286)
汪 列		韩晓东 (302)
王文光		李祥华 (320)
孙良才		张 冠 (344)
任国祥	黄道初	韩民堂 (358)
谢荣策	毕春山	崔思亮 (382)
后 记		(392)



郭隆真

罗占元 许庆昌

郭隆真，河北大名人。1919年在天津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是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春回国，先后在北京、上海、哈尔滨、沈阳、青岛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1年4月被反动军阀杀害。

冲破封建樊笼

郭隆真，原名郭淑善，1894年4月诞生在河北省大名县金滩镇一户回民家庭里。郭家在金滩镇上是一个颇有名望的乡绅之家，她的父亲郭荣桂是个较开明的读书人，对科举考试十分冷淡，不追求功名，赞成康梁变法，崇尚维新，在金滩镇他第一个剪掉辫子，被镇上士绅讥为“异端”^①。

父亲是郭隆真的启蒙教师。她七八岁时，父亲就亲自教她读书、识字。开始只让她读些《三字经》、《百家姓》、《女儿经》之类的书籍。郭隆真受父亲的性格影响较深，她曾向父亲问道：《女儿经》上让我们女儿们“早早起，出闺门”，“烧菜汤，敬双亲”，尽要女儿干这干那，为什么没有一部男儿经，

^① 据郭隆真的叔伯兄弟郭全三和郭荣桂的学生马宇民回忆。

也写上要男儿干这干那呢？父亲说：我国历代相传的规矩是以男为主，男儿要念四书五经，男治外，女治内，因为内外有别，学的东西也就不同，可惜淑善是女儿，要是男儿就好了。郭隆真争辩说：女儿又怎么样，男儿能干的事，女儿也能干，中国古代有木兰替父从军，缙萦上书救父的事情^①，她们都能和男儿一样，为什么现在不让我和哥哥一样去读书？父亲喜欢女儿的聪颖和倔强，更赏识她有一种男儿般的气概，终于允许她和哥哥一起读书。

郭隆真的母亲是一位恪守封建道德的女性。她笃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经常用《女儿经》中“烧菜汤，敬双亲”，“学针线，莫懒身”等条文教训和督促女儿们学习女工针黹和烹饪之事，并对女儿管教极严，要求她们深居简出，行动稳当，有大家闺秀的风范。郭隆真对这些旧礼教的束缚非常反感，经常跑出去和穷人家的孩子一起玩耍。母亲按传统习俗让郭隆真裹小脚，她不肯。母亲说服无效，便强把她的脚裹起来。她大哭大闹，撕掉裹脚布，不吃不喝，以示反抗，最后迫使母亲妥协。

辛亥革命前夕，许多地方兴办新学。金滩镇是卫河沿岸上的一个热闹的集镇，水陆交通方便，外埠的各种消息很容易传到这里。郭隆真的父亲对各地兴办新学的消息很感兴趣。他感到光办新学还不够，还必须创办女学，让女孩子也有上学的机会。1909年，郭隆真15岁时，在父亲的主持下，以郭淑善的名义在金滩镇破天荒地办起了一所女学，定名为元城县^②第

^① 缙萦，西汉著名医学家淳于意的女儿。淳于意在文帝时被人控告下狱，缙萦上书请作官婢以赎父刑。

^② 当时金滩镇属元城县治，1914年后并于大名县。

一女子小学堂。讲堂、自习室都设在郭家院里，一切设备和经费均由郭家自己负担。郭隆真自任义务教员，免费招收了20多名女孩子来读书。学生除了学习新课本外，还学唱反对封建礼教的歌谣。

当时，办女学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其中有个社会舆论问题。许多人家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不愿意让女孩子上学，甚至对女学进行讥笑讽刺。但郭隆真对办好这所女学很认真，主动到一些人家去拜访，说服家长允许女孩子上学。有一次，她勇敢地跑到大街路口张贴广告，上面写道：“中华民国告成，强迫教育实行，男女一律平等，女子上学光荣，咱镇成立女学，专为女子启蒙，无论回汉学生，入学一律欢迎。”^①由于郭隆真的不断努力，到校学生越来越多，人们看法也逐渐改变，这所女学日益得到人们的称赞。1912年5月，一位较开明的直隶省学台到元城县视察教育，发现了金滩镇办起的这所女子学堂。他嘉奖郭家父女，并在县里立案，不久又把这所小学搬到元城县城里，命名为红石桥女子高小。由于办女子学堂有成绩，1913年，郭隆真19岁时被选送到天津直隶女师上学。

然而，生活为她安排了坎坷的道路。原来在郭隆真13岁的时候，父母便给她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婆家。婆家是一个田产房屋很多的地主，只有一个儿子，急于给儿子完婚，好让媳妇过门料理家务，因而一再催促结婚。郭隆真当时强烈反对中途辍学，更不同意结婚。为了躲婚，她长期住校，假期也不回家。这时她父亲已经去世，婆家一再扬言，如果不结婚，就要让郭家吃官司。1917年暑假，郭隆真突然接到“母亲病危”的急信，匆匆回家，见母亲无病方知被骗，经母亲的苦苦

① 大名县金滩镇公社金北大队罗洪章的回忆。

哀求，最后只好“同意”结婚了。结婚那天，郭隆真没有梳妆打扮，仍然穿起那套月白色上衣和黑裙子的学生装。那时新娘坐花轿必须把轿帘放下，不能露面，她却不管那一套，自己硬把轿帘掀开，让新鲜空气透进来。刚过门不久，她就提出仍去天津读书，如不同意就离婚。开始，婆家不同意，但郭隆真毫不让步，经过几次争辩，婆家不得不同意她的要求。她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樊笼，为自己的前途命运开拓了一条新路，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婆家。

战斗在五四运动的前列

郭隆真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先入简易师范班，再入预科，以后才考入师范本科第八级，于1919年暑期毕业。在校期间，她衣着朴素，态度爽朗大方，对人和蔼可亲，同学们都喜欢接近她。特别是她反抗封建礼教和黑暗社会的斗争精神，深受同学们的钦佩。五四前夕，直隶女师实行封建统治，不让学生与外界来往。几次爱国浪潮几乎都没有冲进女师围墙，这里的女学生仍然过着修道院式的生活，郭隆真对此厌恶而且忿忿不平。她曾对妹妹说：“现在我才懂得，从家到天津，如同从一个深渊到另一个深渊。如今国难当头，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我们无聊地生活着干什么？不是当亡国奴，就是舍生取义；我们宁愿舍生取义，也不当亡国奴。”^①郭隆真喜欢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从中寻求救国的真理。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她同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邓颖超等一起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天津学生的五四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著名闯将。5月5日晚上，经郭隆真和邓颖超等研究

^① 《红旗飘飘》23集，133页。

后，于6日下午由郭隆真主持召开了直隶女师各班代表会议。会上，她慷慨激昂地陈述巴黎和会上中国所受的耻辱，揭露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并大声疾呼：“国难当头，妇女应当从深渊中跳出来，冲破封建束缚，救国救民。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① 她的话激励着每个同学，使历来平静的女师校园沸腾起来了。

5月14日，天津成立了学生联合会，领导天津学生运动。但这个学生联合会最初不包括各女校学生。为了把天津各女校学生组织起来，参加爱国运动，郭隆真和刘清扬、邓颖超等，积极到各女校联络，筹备建立妇女组织。经过她们紧张的活动，于5月25日在天津义仓街江苏会馆举行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大会，参加的有天津中西女中、高等女校、普育女中等女校学生600多人。会议公推女师毕业生刘清扬和女师附小教员李毅韬为正副会长，邓颖超、郭隆真、张若名为评议委员，并组成爱国宣传讲演队，以邓颖超、郭隆真为演讲队队长^②。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后，郭隆真率领讲演队日夜奔波在天津的大街小巷，讲演的内容除揭露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罪行外，还宣传争取妇女解放、男女自由平等、反对包办婚姻、保护妇女儿童等。

在爱国学生和全国各界人民的斗争下，北京政府于6月上旬罢免了曹、章、陆三个卖国贼。6月中旬全国学联成立后，立即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运动。各地学联纷纷通电响应，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推选马骏、刘清扬、郭

① 《不屈的共产党人》第1集，7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参见刘清扬《觉醒了的天津人民》，载《五四运动回忆录》，5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隆真等 10 人为代表，与北京学联等一起到总统府请愿。这是郭隆真第一次进京参加请愿活动。在全国人民和在巴黎的中国工人、学生的坚决斗争下，终于迫使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1919 年 8 月，山东军阀济南镇守使马良枪杀山东回教救国会会长马云亭和其他两位领导人，宣布山东戒严，野蛮镇压爱国运动。马良的暴行引起了全国公愤。这时，天津反动当局正在回民中散布“天下教友是一家”的谬论，企图挑拨离间回汉青年的团结。郭隆真和刘清扬等召集天津一部分回族群众开会，向大家指出：既然教友是一家，为什么身披“教友”外衣的马良下毒手杀害了回民马云亭？这分明是骗人的迷魂药，是挑拨回汉团结的阴谋。大家认识提高了，由郭隆真与刘清扬等带领走到清真寺，砸掉了由马良题字的匾额。

接着，郭隆真又一次参加了进京请愿活动。天津学联推出她和刘清扬、张若名以及男学生代表共 10 人，于 8 月 23 日进京。到北京后，他们联合北京学生代表瞿秋白等 15 人，组织了 25 人的请愿团到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刽子手马良，要求爱国自由。总统徐世昌拒不见见。郭隆真在总统府门前对过路的各地群众讲演，痛斥卖国贼枪杀爱国领袖的罪行，带领群众高呼“打倒卖国贼”、“还我山东”等口号。经过一天一夜的斗争，反动政府如临大敌，惊恐万状，忙派军警逮捕了学生代表，将代表们拘押在北京警察厅。警察总监吴炳湘一方面声言要把全体代表枪毙，以威胁爱国群众；另一方面又极力拉拢软化学生代表。北京警察厅长常朗斋是回族人，他知道郭隆真也是回族，企图利用所谓民族感情拉拢她。常朗斋命令从他的小厨房里给郭隆真开饭，但郭隆真不买他的账，坚持和几位被捕的女代表一起开饭。在被拘押期间，郭隆真斗志坚强，她面对

面地斥责敌人说：“爱国无罪，能有人卖国就不能有人救国吗？你今天放我出去，明天我照样进行爱国活动。”请愿代表被捕后，全国各地强烈抗议。在强大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在8月末释放了郭隆真等请愿代表。

9月初，在从北京回天津的火车上，周恩来和郭隆真等男女学生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这次请愿的情况和经验教训。由于并肩战斗的友谊和高昂的爱国热情，使她们打破了传统的男女之间的界限。郭隆真首先提议：为了今后斗争的需要，男女同学要更好地联合起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该更紧密地合作，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有的女生还提议，天津各女校学生可以加入天津学生联合会。这些主张立即得到周恩来等的支持与大家的赞同。周恩来还主张由这两个团体各推举若干人，办一个刊物，以推动天津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于1919年9月16日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定两个组织各派10个人参加。其中男代表有周恩来、马骏、谌志笃等，女代表中有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会上决定出版的刊物叫《觉悟》，主办刊物的团体就叫觉悟社。觉悟社成立时，社员们不用本名，特制定50个号码，以抓阄方法决定每个人的代号，再按号码谐音取一化名。如邓颖超是1号，化名逸豪；周恩来是5号，化名伍豪；郭隆真是13号，化名石杉或石珊。觉悟社一诞生，就请李大钊来指导。李大钊特别称赞他们男女同学合组团体，勇敢打破封建隔阂的精神，鼓励他们团结奋进，努力研究各种思潮。

觉悟社成立后，郭隆真第三次进北京请愿。这是由于8月份请愿目的没有达到，9月间山东形势愈见紧张，应山东爱国团体要求，天津、上海、南京、河南等18个爱国团体的31名

代表陆续到京。天津各界联合会派出代表 8 人，其中有郭隆真、王同华、武绍芬 3 名女生。9 月 30 日，郭隆真等全体代表在北京武绍芬家里开会，研究了第二天的行动计划。10 月 1 日 10 时，全体代表齐集新华门前，要求徐世昌总统接见。在请愿书中，除要求惩办马良、解除山东戒严外，还要求不得补签对德和约，不得与日本直接交涉，取消二十一条，解散安福俱乐部等。徐世昌仍然避而不见，郭隆真义愤填膺，一口气爬到总统府门前石狮子上，面向新华门，大骂总统徐世昌。至当晚 9 时，京师警察厅派出五六百军警，将郭隆真等 31 名代表和一个新闻记者强行押到警察厅。当警察厅派人审讯她们时，郭隆真鄙夷地回答说：我到警察厅来，是你们吴总监把我请来的，别人不能问我！当时京师警察厅上报的公函中记载：“女生郭隆真并向承审员声言，汝非吴姓，无权问我，其势汹汹，出言蛮横，似此当场侮辱，殊属目无法纪。”^① 由于郭隆真等全体代表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北京反动政府于 11 月 10 日被迫释放了全体代表。

郭隆真被释放后，回到天津又投入新的战斗。这时天津人民抵制日货的斗争，仍然如火如荼。直隶省长曹锐命令天津学校提前放寒假，强迫学生回家，以瓦解学生的爱国运动。周恩来、郭隆真等觉悟社骨干成员，提出“反对提前放假”的口号，并组织日货调查团，坚持抵制日货的斗争。1920 年 1 月 23 日，天津学生从东门里“魁发成”洋货庄查获了日货灯罩 17 篓，“魁发成”奸商勾来日本浪人殴打学生。天津各界联合会推举代表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惩办凶手和奸商，但省公署逮捕了请愿代表，查封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激

^① 中华民国 8 年 10 月京师警察厅公函，存北京档案馆。

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的愤慨。在觉悟社的周恩来、郭隆真、于兰渚、张若名等直接领导下，天津 1000 余学生于 1 月 29 日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请愿活动。他们来到省公署，大门紧闭，省长不见。周恩来、郭隆真等奋不顾身，从省公署大门门槛空档挤了进去，要找省长算账。警察逮捕了周恩来、郭隆真等 20 多名学生代表，镇压了请愿示威群众。

在警察厅拘押期间，司法科长高登甲曾传讯郭隆真，但郭隆真每次大义凛然地回答，都使他无法再问下去。而郭隆真却反过来质问高登甲拘押的理由，更使他狼狈不堪。有一次高登甲路过郭隆真和张若名的牢房门前，郭隆真从窗户里大喊：“请司法科长站住！我们有句话说。”高登甲表示不屑于与女学生讲话，郭隆真怒斥他蔑视女子人格。

警察厅对被捕的学生代表严加隔离，不准互相往来，又不准备公开审理。周恩来、郭隆真等秘密串联全体被捕代表，进行绝食斗争，坚决反抗非法拘押，要求公开审判。在全市人民的声援下，他们的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4 月 7 日全体被捕代表 21 人被移送到检察厅。他们在检察厅里得到了可以看书学习、互相往来和开展娱乐活动的权利。郭隆真这期间虽然曾经患病，但始终保持乐观的精神和旺盛的斗志。她积极地学习，热情地联络和照顾大家，受到了大家的敬重。4 月 11 日是郭隆真的生日，周恩来代表大家特赠送镶有国旗的一面镜子，表示祝贺。郭隆真很受感动，给周恩来等写了一封饶有趣味的短信，信上说：“蒙你们诸位为祝我的生日，我实在感激！一鞠躬。劳你们诸位的精神，作个纪念品！再鞠躬。叫我的精神愉快百倍！三鞠躬。”^①周恩来后来编写的《警厅拘留记》和

①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爱国运动》（上），52 页。

《检厅日录》两篇历史文献中，详细记载了郭隆真等被捕代表的斗争情况。由于全体被捕代表和天津各阶层人民的坚决斗争，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于7月7日开庭审讯被押半年之久的周恩来、郭隆真等21名代表，并于7月17日宣布所谓“期满释放”。周恩来、郭隆真等在法庭门前被欢呼的人群包围起来，给他们每个人胸前戴上了铸有“为国捐躯”四个金字的纪念章和大红绸花。

赴法勤工俭学

五四爱国运动后，中国知识界广泛兴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新浪潮。这时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一部分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中国，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寻求马列主义真理而积极倡导和发动的，它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郭隆真和当时许多先进青年一样，为这股巨大的浪潮所吸引，决心赴法勤工俭学以开阔自己的眼界，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觉悟社和天津学联的同学们热情支持郭隆真，并为她筹措了出国的旅费，帮助她实现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愿望。

1920年10月31日，第十五届赴法学生团组成。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等都是这届赴法学生团的成员。11月7日，郭隆真等197人乘坐法轮保尔到斯号放洋赴法^①，于1921年初到达法国。

当时法国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出现不景气的时期，许多工厂资本家裁减工人，大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遇到了极大困难。华法教育会不仅不履行代找工作、安排就学的职责，反而

^① 见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二册（上），146页。

把国内的一点捐款也贪污中饱,使许多勤工俭学学生求学不能,做工不得,生活无着。为改变这种困难处境,1921年2月27日,勤工俭学学生召开了代表大会,通过了争取“吃饭权、工作权、读书权”的斗争口号;28日组织了400多勤工俭学学生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示威,郭隆真、张若名等参加了这次运动。

此后,郭隆真与张若名进入巴黎郊区一家云母厂当工人,工作非常艰苦,每天为云母片打眼,完工后周身酸痛。郭隆真以极大的毅力克服困难。这时期她直接接触了法国工人和华工,与他们一起感受到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与压迫,也进一步了解了法国以及欧洲工人运动的情况。她努力地学习法语,如饥似渴地阅读法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她工资微薄,经常吃的只是炒洋白菜和粗面包,但她仍然节省一些工资用来帮助张若名人校学习。她的这种舍己为人精神,得到了广大勤工俭学学生的称赞。

留法勤工俭学的男女学生,虽然多次斗争,但经济困难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有许多人无法维持生活,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冻饿交迫,困苦颠连,甚至有自杀者,而女生之苦尤甚。郭隆真于1921年秋考入法国省立女子高等学校,但她和许多女学生一样,生活异常凄苦。为此,她写了血书及泪书寄回国内,刊登在1921年12月22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她在以《人道》为题的血书中呼喊:“隆真饿!隆真冻!隆真的冻饿,只是全人类间一分子之冻饿,何足轻重,不过隆真推想世人不愿见不人道之悲惨发现在20世纪新世界人道的声里!请速维持人道!施一粥半缕,以救隆真饿寒交迫,身葬异乡之惨。”^①在另一封泪书里,郭隆真揭露华法教育会办事人员脑筋腐败,排斥女生,挥霍巨款,

^①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二册(下),688页。

动用留法学生之存款，“致使饥寒迫亡的女生告急无门”。

郭隆真的血泪书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很大的震动和同情，《时事新报》在发表血泪书同时，还加了编者前言：“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因不能维持生活，已有被遣送回国者。而留法者仍属困苦颠连，莫可告语，其中举目无亲之女生，更有行将冻饿以死之慨。昨有郭隆真女士，寄来血书明信片一张，系断指所书者；另有乞援书一封，并饥寒状况之报告。字字沉痛，不忍卒读。想巴黎沦落人，必不至一郭女士，郭女士悲声，或即留法工学生之悲声也。”^①前言中还呼吁北京政府当局在“政事百忙之中，亦应分出一二分精力，注意及此”；警告当局“倘不力筹救济方法，恐将陷许多青年绝地”^②。

1923年夏，山东临城匪徒劫车案^③发生后，英、美、法、意、日、比、荷等帝国主义外交使团多次开会，以“中国土匪猖獗，政府无能”为由，议决在中国设国际警察，共管全中国铁路，并已讨论具体实施办法。在法华人闻此消息，愤慨万分，于7月8日集会巴黎，商量对策。郭隆真代表旅法女子勤工俭学学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以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宗旨；并组成了以周恩来为主的书记股，以何鲁之、徐特立为主的经济股，以郭隆真为主的交际股，以许德珩为主的新闻股，以袁子贞为主的庶务股，领导这一斗争。嗣于15日召开了旅法华人救国大会，发表了《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为国际共管中国铁

①②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二册（下），688页。

③ 山东临城匪案，是指以孙美瑶（张敬尧）为首的大股土匪于1923年5月5日深夜，掘毁了山东临城境内一段铁路，使从浦口开往天津的火车出轨，然后抢劫火车上的行李财物，并劫走中外旅客200多人，以勒索金的事件。

路事告旅欧华人》两份重要文件，表示：“我们便当一致起来，誓死力争，推翻扰乱中国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打倒这妨害中国和平统一的万恶军阀！”“要内以民族自决，外以团结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共同起来反抗。”这两份重要文件还指出：“为要贯彻我们的主张，最后我们终要逼出一个国民革命行动来了。”^①郭隆真参与领导的旅法华人的这场斗争，也鼓舞了国内各阶层人民的斗志。各帝国主义慑于中国人民斗争的威力，也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使他们共管中国铁路的阴谋未能得逞。

通过各种政治斗争，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中，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1921年，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得到上海中共中央通知，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2年，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工作^②。旅欧党团组织建立后，许多进步的勤工俭学学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郭隆真在斗争实践中受到了锻炼，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于1923年加入了团组织，同年转为中共党员^③。

①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二册（下），799页。

② 胡华：《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载《周恩来的思想和理论贡献》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郭隆真自传中说：“在1923年春遇少年杂志记者于里昂，遂对共产主义讨论两次，说我具备革命者的条件，对于主义有相当的认识，结果周恩来、尹宽等遂介绍我加入S(C)Y。”另据蔡畅1939年4月15日回忆她在法国勤工俭学中的活动时说：“1923年头，党刚成立不久，我即刻加入了共产党”；“我是负责党的组织部的工作的，当时除我之外只有四个女党员；有两个是湖南来的，其余三人就是郭隆真、张若名、熊季光”（见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三册，406页）。

郭隆真入党后，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目标和方向，并且学会了应用阶级斗争观点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和黑暗，从而发出了为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奴隶谋求解放的呼声。当时在法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叫王亚森的中国少女，被拐骗到法国给资本家当仆人，资本家不但不给工资，还常常施以残酷虐待，最后驱逐出门。郭隆真就此事发表了《法国资本家虐待中国女子》一文，尖锐地指出：“这就是资本制度的罪恶！法国资本家不知奴隶了多少法国女子，现在且奴隶中国女子。王亚森这件事不过是法国资本家黑暗势力下的一个发现，我们应该为已发现的王亚森谋解放，同时亦应该为未发现的女奴隶谋解放！”^①

1924年秋，郭隆真结束了4年的勤工俭学生活，和李富春、蔡畅等一起离开法国，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进行短期学习。她亲眼看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的情景，增强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信心。1925年春，在国内革命高潮的形势下，她满怀革命激情回到北京。

从事北京地下党的活动

郭隆真回到北京后，在李大钊为书记的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领导下工作。这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郭隆真被李大钊派到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妇女部工作，化名林一（林逸）。妇女部创办了一个刊物叫《妇女之友》，分别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各派一位代表负责主办，郭隆真代表共产党方面负责，

^①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三册，58页。